

试论彼奥提亚统一运动

冯金朋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彼奥提亚作为希腊世界中一个重要的地区,它的统一运动较之其他地区更为特殊,不仅历时漫长且又颇费周折。在经过邦联制阶段后,彼奥提亚统一运动陷入了联邦和帝国路线之争中。强大的底比斯欲将联邦制的同盟转变为帝国,而其他一些彼奥提亚城邦则靠外部力量的援助保持独立;直到希腊化时期,底比斯的强权被彻底摧毁,彼奥提亚地区才在联邦体制下实现统一;但是,这种无足轻重的统一最后又被罗马人破坏。彼奥提亚统一运动的成败给后世留下了深刻教训,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关键词:彼奥提亚;统一运动;同盟;邦联;联邦;帝国

中图分类号:K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79-07

古希腊文明是城邦的文明,它兴于城邦、亦亡于城邦;在兴亡之间,古希腊人也在尝试着突破城邦制度的局限,以应对来自城邦内外的危机。如前苏联著名的古典学者Θ·Π·弗罗洛夫所言,“古希腊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就是城邦的历史过程,但是这段历史本身是在不断被否定的形式中过来的”^{[1]6}。统一运动便是对城邦制度的一种“否定的形式”,它贯穿于希腊城邦的产生、发展以及消亡的整个历程;尽管泛希腊统一运动最终通过异族征服的方式加以完成,但希腊世界的局部统一运动却不乏成功的范例。例如,阿提卡地区的统一,雅典授予其他城邦公民以公民权手段,逐步将阿提卡演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南伯罗奔尼撒地区的统一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斯巴达用武力征服的方式臣服了周围城邦,将其居民变为无公民权的边区民和无任何权利的希洛特,从而在这个“辽阔”的版图上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

彼奥提亚地处希腊大陆中部,面积约为2 580km²,散布着底比斯(Thebes)和奥科摩诺斯(Orchomenos)等大约十或十二个城邦^{[2]393};它兼有土肥之利和地理之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该地区也像希腊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经历过一场统一运动,并且,这场统一运动较之于雅典式和斯巴达式的统一运动,也具有自己的特征。后来居上的底比斯在公元前6世纪顺应时代要求担负起彼奥提亚统一运动的领袖,但是,它却采取了失当的方式,加之外部势力的影响,最终致使这个地区的统一运动不仅历时漫长又颇

费周折。但是,学者们普遍关注对后两者的统一运动,而对彼奥提亚统一运动却较少言及。笔者在此试陈陋见,以期赐教。

根据彼奥提亚的局势演变,笔者将其统一运动分为四个时期:从彼奥提亚近邻同盟建立到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结束、从公元前479年到公元前387年大王和约签订、从大王和约签订到公元前335年底比斯城被毁、从底比斯城被毁到公元前171年彼奥提亚同盟被解散。

早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甚或更早的时候,彼奥提亚便已存在某种联盟。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它们派出了50艘船参加希腊远征军,其中,奥科摩诺斯和它的附属地雅斯普兰顿(Asplendon)共同筹建了30艘^{[3]II,494-517}①。据博茨福特(G. W. Botsford)考证,这个同盟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此时的同盟仅仅是宗教性质的近邻同盟(Amphictyony)^{[4]272}。彼奥提亚诸邦出于对海神波塞冬和女神埃图诺斯·雅典娜(Itonian Athena)的共同信仰而结成同盟,同盟的主要职能是管理波塞冬的圣林所在地昂科斯托斯(Onchestus)和雅典娜的圣域、举办“泛彼奥提亚节”(the Pamboeotia)的庆典活动以及选举派代表参加德尔菲近邻同盟议事会(the Delphic amphictyonic council)等事务。彼奥提亚近邻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这个地区统一运动的开始。

① 本文对古希腊罗马著作的引用,如未特别注出版本,皆出自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罗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并且,古典文献引文的注释格式均依照国际古典学学术惯例,即只标注传统的章、节、段、行,而不标注丛书的现代页码。

收稿日期:2008-10-09

作者简介:冯金朋(1978-),男,河南许昌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世界古代史及史学史。

在这个时期,尽管彼奥提亚各地区仍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独立城邦,但是它们的政治架构趋于一致,都采取了比较温和的贵族统治^①。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感和宗教上的密切联系最终有助于促进这个地区的政治合作与统一。同时,彼奥提亚地区在经济上也出现了某种统一的迹象。最富有的奥科摩诺斯发行了最早的彼奥提亚货币,它采用的是埃吉那盾的标准(the Aeginetan standard)。同样的做法很快在彼奥提亚其他地区开始流行,币制的趋同有利于加强彼奥提亚各地区的商品交流,进而促进其在经济上的统一。

进入公元前6世纪,彼奥提亚的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此时奥科摩诺斯仍然控制着雅斯普兰顿,但是后来居上的底比斯在彼奥提亚的地位,逐渐超过了这个传统的富邦。失势的奥科摩诺斯开始表现出分离主义的倾向,它放弃了传统的币制,另创一套体系^{[4]273}。

正当彼奥提亚内部在经济走向统一过程中出现分裂迹象之时,外部环境也变得严峻起来。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色萨利人完成了对佛西斯(Phocis)地区的控制之后,企图进一步南下,并与处在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僭主统治之下的雅典交好,这使得彼奥提亚处在包围之中,有被瓜分或征服的危险。而传统的近邻同盟仅仅是组织松散的宗教同盟,不具有将

彼奥提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统一起来的能力;外敌压境,建立一个组织性更强的同盟来应对外部威胁成为了彼奥提亚地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崛起中的底比斯主动担负起这项历史使命,它将原来的彼奥提亚近邻同盟改造为彼奥提亚同盟,这次改造大约发生在稍早于公元前520年的某个时间^②。此举标志着彼奥提亚从宗教文化统一向政治军事统一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同盟成立之初,并不是原来的所有近邻同盟成员都参加到了其中;至于有多少城邦加盟,无从考证,其核心成员主要有底比斯、克罗尼亚(Coronea)、塔那格拉(Tanagra)和特斯佩亚(Thespia)^{[5]V.79}。同时,为了加强盟邦间的经济联系,同盟还发行了统一货币。

同盟是根据联邦原则建立起来的,学者普遍称这个同盟为联邦同盟(federal league);但是,它的具体运作程序是如何进行的,后世学者尚未详考。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学界对同盟的联邦机制在实际中的运作情况甚为不满。尽管彼奥提亚同盟是基于联邦原则而建,但它的联邦性质却被深深地打上了底比斯帝国主义的烙印,并且,底比斯的帝国主义还不断地腐蚀着同盟的联邦性质^③。19世纪的英国学者爱德华·A·弗里曼从联邦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彼奥提亚

① 彼奥提亚诸邦的政体大致情况如下,首先,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只有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公民才享有出任公职的政治特权;其次,不设公民大会,仅设立四个议事会(Boulé),相互制衡,共决国事。(J. A. O. Larsen, *The Boeotian Confederacy and Fifth-Century Oligarchic Theory*[J].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86, 1955, p. 41.)

② 关于彼奥提亚近邻同盟和后来的彼奥提亚同盟之间的历史关系与后者何时成立的问题,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未作出具体结论,只是大致承认两者之间有很大的继承性;例如,弗里曼和博茨福特都谨慎地避免了将问题细化。(详见:G. W. Botsford, *The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s of the Boeotian League*[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10 p. 272; Edward A. Freeman,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M]. vol. I, London: Macmillan & Co. 1863. p. 159-160.)直到20世纪70年代,R·J·巴克(R. J. Buck)才在这两个问题上做了大胆的推断,他认为底比斯在彼奥提亚近邻同盟的基础上组建了联邦性质的彼奥提亚同盟,这次改造大约发生在稍早于公元前520年的某个时间。(R. J. Buck, *The Formation of Boeotian League*[J].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7, No. 2. 1972, p. 94.)我国学者李天祐推测这个同盟成立的时间是公元前575年前后(李天祐. *古代希腊史*[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第181页)。

③ 本文中所使用的“帝国”或“帝国主义”,是现代术语在古史研究中的便宜用法。现代学界认为,帝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且具有强制性(作为一个原则)的国家,不一定必须是、但经常是由皇帝来统治”(Encyclopaedia Britannica—An New Survey of Universal Knowledge, vol. 8, 1956, p. 402.);换个说法,它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其中,由一个中央政权(a central authority)对广阔且又分散的领土、并且是多个民族行使主权”(Encyclopedia Americana, vol. 10, 1988, p. 312.)。帝国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它可以是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的联邦,也可以是像沙皇俄国那样的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还可以是像大英帝国那样的由自由邦国组成的一个松散共同体与许多处于从属地位的领地联合起来组成的国家(Encyclopaedia Britannica—An New Survey of Universal Knowledge, vol. 8, 1956, p. 402.)。从这些权威定义看,在马其顿帝国之前,古希腊世界不存在帝国现象。尽管这些定义是从近现代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帝国”(Empire),在古希腊语中却有对应的词汇——arché。所以,在古希腊也同样存在“帝国”;例如,在古希腊人眼中,提洛同盟便是“帝国”(arché),这也是后人将提洛同盟称为雅典帝国的最直接原因。西方古典学界为了本领域的研究需要,对“帝国”作了一个专业性的定义: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其中的统治国不管实行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政体,都不会影响这种国家的性质,也即对这种国家的性质“造成任何本质性的变革”(威廉·弗格森. *希腊帝国主义*[M]. 晏绍祥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1页)。以弗格森的“帝国”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将底比斯对彼奥提亚同盟实行的政策称之为帝国主义政策,其目标是将同盟变为底比斯主宰下的强制性国家——帝国。同时,用“邦联”、“联邦”等现代术语来表述古希腊的城邦同盟性质,并非笔者首创,而是承袭英国学者弗里曼的做法;而关于将邦联、联邦和帝国视为统一的形式也非笔者臆造,而是来源于《大美百科全书》的说法。

同盟多有贬抑，“毫无疑问，彼奥提亚同盟是一个安排极差的政治设计(a very ill arranged political contrivance)”；底比斯的势力强大，远远超过其他城邦，它同时又是同盟政府所在地，这决定了彼奥提亚同盟“不可能成为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政府”；底比斯的强势，作为对同盟的联邦平等性(Federal equality)的一种威胁，势必最终将其摧毁^{[6]155-157}。

底比斯的崛起，已经使得彼奥提亚地区的其他一些城邦对它怀有戒心；而它将新建立的同盟变成自己推行帝国主义的工具，则对其他城邦造成了更大威胁。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一些城邦寻求外部支持；例如，奥科摩诺斯与色萨利人建立友好关系，而普拉提亚则在斯巴达的建议下与雅典确立同盟关系。公元前519年，底比斯想通过武力迫使普拉提亚加入同盟，在雅典的支持下，普拉提亚成功地做出了回击。从此，底比斯和雅典开始陷入一百多年的敌对状态；普拉提亚及其附近地区，在雅典的支持下一直独立于彼奥提亚同盟之外。色萨利实力衰落后，底比斯于公元前510年左右迫使奥科摩诺斯又回到了同盟之中，但对普拉提亚的收复一再失败。公元前506年，底比斯又与斯巴达和科尔启斯联合共同进攻雅典，以图夺取普拉提亚等地，却因斯巴达临时退出而遭惨败；后又联合埃吉那反扑，亦遭败绩。

统一运动受挫，底比斯将其归咎于雅典、斯巴达等城邦从中作梗，这种情绪导致了它在抗击波斯的战斗中表现不佳并最终投降了波斯。但是，底比斯想借助波斯之力完成统一事业的美好愿望，最后随着波斯军队公元前479年的大溃败而破灭。底比斯不仅未能完成统一，反而因为对希腊自由事业的背叛而被剥夺了同盟的领袖资格^{[7]xi,81.1}。

关于彼奥提亚统一道路，底比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雅典式的，一种是斯巴达式的。阿提卡地区的统一是雅典和本地区其他小城邦相互妥协的结果，小城邦放弃所有主权并撤销了独立的政治机构，而雅典则将本城邦的公民权授予这些小城邦的公民，从而使阿提卡地区变成了一个各组成部分一律平等的统一国家。斯巴达则通过武力的手段征服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地区，将其居民变为无公民权的边区民和国家奴隶希洛特，然后使用军国主义手段来维持现状。但是，底比斯没有雅典的胸襟来招揽周围的小邦，采取雅典式的道路来完成统一。同时，其外部环境又不允许底比斯选择斯巴达式的道路，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完成地区统一；周边大的城邦为了维持自身优势，

不希望看到彼奥提亚的统一和底比斯过分强大。由是，底比斯一直在彼奥提亚统一运动中扮演着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同时，由于底比斯不向盟邦开放它的公民权反而执行倒行逆施的帝国主义政策，最终导致彼奥提亚的小邦尽管和底比斯结盟、但仍努力保持程度不同的分离主义倾向。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尽管彼奥提亚地区建立了同盟，名义上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由于没有牢固的情感纽带联系，实际上非常脆弱。彼奥提亚各邦要实现真正的统一，需要完成的任务还有很多，并且还需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和等待恰当的时机。

二

在希波战争中的投敌行为致使底比斯本来不高的威望在战后又骤降，彼奥提亚同盟也随之名存实亡。但是，希腊战后的局势并非完全对底比斯和彼奥提亚不利，在战争中崛起的雅典向斯巴达的霸权发起普遍的挑战，希腊世界“两极”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这为它们提供了复兴的机会。

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在德尔菲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提议，将彼奥提亚和背叛希腊的其他地区驱逐出德尔菲近邻同盟，企图将德尔菲近邻同盟进一步变为它的霸权工具；而底米斯托克利出于考虑雅典利益，挫败了斯巴达的企图^{[8]20}。由于彼奥提亚地区诸邦普遍实行寡头统治，在意识形态上与雅典存在着根本对立，雅典的“恩惠”并没有在此地赢得好感。尤其是遭到普遍唾弃的底比斯，为了恢复失去的尊严和地位，反而不惜许诺以向雅典开战为条件来获取斯巴达的支持^{[7]xi,81.2}。雅典势力的迅速膨胀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它逐渐改变了原来的政策，转而扶植底比斯，不仅帮助底比斯扩建了城墙还迫使彼奥提亚诸邦臣服于它^{[7]xi,81.3}。斯巴达此举引起了雅典的不安，雅典集倾国之兵攻占除底比斯之外的整个彼奥提亚地区和佛西斯，摧毁塔那格拉的城墙，并提取100名最富有的罗克里斯人作为人质，从而大大增强了雅典在希腊大陆中部的影响^{[7]xi,83.1}。

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57年，此后的十年里，彼奥提亚政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期。雅典以彼奥提亚解放者自居，推动各地的民主革命，推翻寡头政体，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势力开始流亡生涯。但是，这些流亡者于公元前447年在克罗尼亚袭击雅典驻军成功，以退还俘虏为条件，最终将雅典的

势力驱逐出了彼奥提亚。^①

克罗尼亚战役胜利后,彼奥提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它同时也是底比斯霸权的强化期。尽管底比斯在驱逐雅典势力方面并未起重要作用,但是,它却抢夺了胜利果实,重建同盟,并将彼奥提亚诸邦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②。彼奥提亚的货币进一步统一,货币被冠以底比斯之名,不再照顾其他城邦的个体意愿;这一次货币统一并没有遭到反对,可见,底比斯对盟邦的控制远远超过了以前的程度。关于此次同盟的建制,史料相对丰富。底比斯对整个彼奥提亚地区进行了类似于克里斯提尼的区域划分,将整个地区分为11个区(unit),每个区派出60名代表组成同盟议事会、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同盟的最高领导机构——彼奥提亚执政团(Boeotarchs)、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同盟法院来管理同盟的司法事务;其中,底比斯、普拉提亚及其合并地、特斯佩亚(Thespia)及其合并地分别占两个区,其余各地分别占一个区。同时,每个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例如:向同盟提供一千名重装步兵、一百骑骑兵,提供同等数量的同盟经费以及各自承担本区军费支持。

从表面上看,同盟是按照联邦原则建立而成,虽然底比斯占有优势,但同盟权力的分配也似乎比较公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初的情况不甚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公元前431年之前,底比斯已经取得同盟的绝对霸权;公元前431年,为了将普拉提亚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它入侵该地,由此挑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底比斯的霸权还在公元前427年之后又得到进一步加强,普拉提亚被屠城后,底比斯向此地派出了大量移民,使之成为第二个底比斯^{[9]III.68};普拉提亚拥有的两个彼奥提亚执政官的名额,也顺理成章地为底比斯控制,再加上它的影响力能够威吓和拉拢其他一些城邦,所以,底比斯基本上能够控制整个同盟,将其变为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9]IV.91-93}。

但是,底比斯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为了使整个同盟彻底变成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底比斯还不断打击从前不驯服的城邦,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又给它提供了

诸多良机。底比斯利用战争之机,采用多种手段消耗彼奥提亚诸邦的力量,以加强对整个地区的控制。例如,在公元前424年的德里温战役中,底比斯在战阵安排上便是刻意保护自身实力,以消耗盟邦力量来换取最后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特斯佩亚损失最大,可以说贡献也最大;但是,却在第二年被底比斯逼迫拆除了城墙,借口是它有亲雅典的倾向;而修昔底德指出,此举是底比斯早有预谋的^{[9]IV.133}。在此前后,底比斯也对奥科摩诺斯进行了削弱,将其辖地凯罗尼亚(Chaeronea)变为独立的城邦,并使之与阿克拉菲温(Acraephium)结盟。底比斯经过一系列政治整合,最终成为彼奥提亚不容挑战的霸主。总而言之,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底比斯的势力急速膨胀,在它主导下的彼奥提亚统一事业进一步发展,彼奥提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统一国家(a consolidated state)。

但是,底比斯在统一运动中的一些过激行为却惹恼了斯巴达。例如,公元前419年,趁斯巴达陷入内外交困之机,底比斯借口斯巴达在赫拉克利亚的驻防官阿基息比达无能,将此地从斯巴达手中夺回。斯巴达虽然没有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却增加了对底比斯的提防之心^{[9]V.52}。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彻底失败而告终,底比斯和斯巴达的矛盾便凸显出来;斯巴达便致力于遏制底比斯、解散其同盟,彼奥提亚诸邦的分离主义者也借机又一次活跃起来。公元前394年,斯巴达成功地将奥科摩诺斯从彼奥提亚同盟中分离出来,这给底比斯的统一事业造成重击。但是,更严重的打击还尚未降临。公元前387年,在波斯的协助下,斯巴达迫使底比斯不得不在《大王和约》(the Peace of Antalcidas)上签字,解散彼奥提亚同盟,恢复诸邦的独立。至此,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再次彻底夭折。

这一时期,彼奥提亚统一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底比斯的帝国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底比斯一直努力将彼奥提亚同盟从联邦转变为帝国,尽可能地削弱盟邦的势力和权利,这势必导致加盟邦的反抗,同盟内部的分离主义一直存在;只要有足够的外部支持,

^①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 113. 至于雅典是否在公元前447年放弃了普拉提亚,学界对此存在争论。修昔底德的记载缺乏前后承接,他在此节(I, 113)记载彼奥提亚整个地区获得了独立;但是,他又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说,普拉提亚是雅典的盟友并且一向与底比斯敌对;所以,公元前431年,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就是为了将该地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同时,其他相关材料的记述与修昔底德的前一节类似,同样没有提到普拉提亚。博茨福特认为雅典没有放弃普拉提亚(详见:G. W. Botsford, *The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s of the Boeotian League*[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10 pp. 283-284.),而拉尔森认为雅典可能曾暂时撤出了该地,并且普拉提亚还加入到重建的彼奥提亚同盟中(详见:J. A. O. Larsen. *Orchomenu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Boeotian Confederacy in 447 B. C.*[J].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55, No. 1, 1960, pp. 10-12.)。

^② 但是,拉尔森(J. A. O. Larsen)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由于奥科摩诺斯在驱逐雅典势力过程中贡献最大,所以,同盟重建初期,它在同盟中的势力要强于底比斯。(详见J. A. O. Larsen. *Orchomenu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Boeotian Confederacy in 447 B. C.*[J].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55, No. 1, 1960, p. 9.)

他们势必会从同盟中独立出来,而这种外力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逐渐强大起来,内外合力最终摧毁了底比斯的妄想。

三

公元前 387 年《大王和约》的签订,给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造成致命一击。从希腊当时的局势看,彼奥提亚的统一似乎不存在任何希望;因为,波斯和斯巴达都不希望看到有哪个城邦能强大到足以挑战它们霸权的程度。如果说彼奥提亚的统一仍然存在希望的话,这个希望只能来自内部,并且很可能仍然来自底比斯,因为它在该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在当时并未强大到足以与波斯、斯巴达和本地分离势力的合力对抗的程度,所以,底比斯必须实现自我突破,才能再次领导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

而此时底比斯也正酝酿着一场革命运动。自从公元前 457 年雅典征服彼奥提亚开始,这个地区的民主势力迅速壮大,虽然在公元前 447 年失势后,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伯罗奔尼撒战争极大地自己了彼奥提亚特别是底比斯的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壮大了民主力量,底比斯的政治天平开始向民主派倾斜。正当民主运动处在酝酿之时,底比斯的政治出现了历史的反动,底比斯的亲斯巴达派在公元前 382 年成功夺取政权,将温和的贵族政体转变为极端的寡头政治,并依靠斯巴达在底比斯首府卡德美亚(Cadmea)的 1 500 名驻军维持独裁统治^{[6]171}。这一事件将底比斯的政治发展引入瓶颈状态,但这一瓶颈状态很快便被底比斯的两个伟大人物打破。公元前 379 年,伯罗庇达(Pelopidas)成功地推翻寡头统治、驱逐了斯巴达驻军。革命成功后,伊帕米依达(Epameinondas)协助伯罗庇达共同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建立了类似于雅典的民主政体和“新型”军队,他们给底比斯乃至整个彼奥提亚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彼奥提亚同盟也于公元前 378 年再次建立。同盟的建制比过去民主了许多,最显著的是,它成立了民主的彼奥提亚公民大会(Boeotian Assembly);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底比斯并不允许其他城邦对自己的决策持有异议。“尽管彼奥提亚诸邦乐意加入这个重建的彼奥提亚同盟,但很快发现,彼奥提亚同盟仅仅是底比斯专制统治的另一个名称而已。”^{[6]173}底比斯不仅又一次将彼奥提亚诸邦降为自己的附庸,更甚者,还对普拉提亚、奥科摩诺斯、特斯佩亚等过去有仇隙的城邦进行残酷镇压,将其居民或杀或卖或驱逐;总而言之,此时的彼奥提亚不再是一个“城邦联盟”^{[10]14}。底比斯的帝国主义最终将彼奥提亚同盟强化为了一个带有浓厚强制色彩的统一国家,彼奥提亚

同盟的联邦性质彻底终结。

底比斯的复兴和强大让斯巴达感到不安,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进军彼奥提亚,试图以武力解散彼奥提亚同盟;但是,伊帕米依达采用新型战阵——“斜楔形阵”,在留克特拉(Leuctra)一举击溃斯巴达无往不胜的重装步兵。此役之后,底比斯迅速在希腊世界中崛起,雄心勃勃的伊帕米依达企图建立一个底比斯领导下的希腊帝国;但天不遂人意,伊帕米依达在公元前 362 年战死,这个宏伟计划也就戛然而止。

随着卓越领袖的逝世,底比斯的实力迅速下降;依靠底比斯强权维持的彼奥提亚地区的统一局面也遭到挑战,很快,奥科摩诺斯、特斯佩亚等传统敌对城邦借助外力相继独立。崛起的马其顿又给底比斯雪上加霜。公元前 338 年凯罗尼亚战役(Battle of Chæronea)之后,普拉提亚、特斯佩亚、奥科摩诺斯和克罗尼亚重新崛起,并与马其顿结盟;底比斯不仅被四个敌对城邦包围,还被马其顿派入驻军以作监管。底比斯更悲伤的命运在两年后才真正发生,与亚历山大大帝作对给这个城邦带来了灭顶之灾;公元前 335 年,底比斯被夷为平地,其领土被分配给了普拉提亚、特斯佩亚、奥科摩诺斯和克罗尼亚等四个城邦。至此,底比斯主导的彼奥提亚统一运动不仅前功尽弃,就连其自身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一时期,彼奥提亚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底比斯这种统一方式是对城邦制度的一种根本否定,它违背了希腊文明的根本原则,无助于希腊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幸运的是,这场统一运动未能成功跨出彼奥提亚地区,否则整个希腊文明将不会给我们留下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它最终以底比斯亡国为终点,这再一次说明,在城邦传统根深蒂固的希腊世界,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强制性的统一国家是行不通的。

四

底比斯亡国了,但是,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并未因此终结;它的灭亡反而为彼奥提亚统一回归到一条合理可行的道路上来提供了契机。

至于希腊化时期的彼奥提亚同盟何时重建,学界尚未确定其具体日期;不过,它彻底贯彻了联邦原则。这个时期的同盟建制,主要包括联邦大会(the Federal Assembly)、将军(a single general)和彼奥提亚执政官(Boeotarchs)。联邦大会是同盟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联邦大会里,每个同盟成员都有一张独立平等的选票,他们以民主原则来决定同盟事务。同盟设立一个将军,他是同盟的首领,其职能类似于过去的联邦执政官。彼奥提亚执政官组成政府,负责同盟的行政事

务^{[6]183}。不过,加盟城邦仍保留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某些仍拥有某种程度的外交权力^{[11]xxvii.5}。

底比斯尽管在公元前316年复国并重新崛起,又在同盟中依然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它是同盟的首领、同盟大会也在这里召开;但是,它已不再是霸主。平等原则消弭了同盟内的分离主义倾向,彼奥提亚在心理层面的统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联邦原则贯彻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波里比乌斯在《通史》中总是将彼奥提亚视为一个政治实体,底比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此前的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则恰恰相反,经常用“底比斯”来代称“彼奥提亚”。

尽管彼奥提亚以希腊城邦世界普遍能够接受的联邦形式组成同盟,将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引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是,这次统一并未给彼奥提亚和底比斯带来复兴,它们在这段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自从公元前335年底比斯亡国后,彼奥提亚地区从希腊政治中的主动者突然降为被动者,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与它发生联系;它曾为恢复伊帕米依达时代的荣耀所做的一切,都是适得其反。例如,公元前245年,彼奥提亚同盟借阿卡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发生冲突之机,与前者结盟;而埃托利亚同盟抓住战机,一举击溃彼奥提亚同盟军。此次战败,最终摧毁了彼奥提亚同盟所有的对外政治欲求;为了维持自存,它不得不见风使舵,在马其顿、埃托利亚同盟、阿卡亚同盟和后来的罗马等强权之间随风倒,沦为希腊政治棋盘上一颗受人驱使的棋子。实力骤降且又复兴无望,这在彼奥提亚人的心理上造成痛击,民族精神全面崩溃;居民们整日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政治陷于瘫痪,公职人员普遍缺乏敬业之心,竟然将整个地区的司法审判活动荒废了25年^{[11]xx.4-6}。“彼奥提亚”一词最终成为“愚笨”、“无可救药”的代名词,就连出生于此地的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对此也给予了肯定^{[12]995 F}。

成为“希腊主人”的罗马,为了更好地控制希腊,如同波斯和马其顿一样,也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尽管彼奥提亚同盟已经虚弱不堪并在一定程度上沦为罗马的附庸,但是,罗马仍不愿意看到它的统一局面。公元前173年,彼奥提亚同盟与马其顿国王珀耳修斯结盟,这便为罗马提供了借口,罗马借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机,于公元前171年将其解散。至此,彼奥提亚同盟彻底解体,彼奥提亚地区的统一运动也最终以失败收场。更不幸的是,随着联邦同盟的解体,彼奥提亚诸邦之间的认同感也在淡化;在罗马人统治下,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残害甚至沾染上了卑鄙的色彩^{[13]2}。

从彼奥提亚的整个统一历程来看,其中存在着三

条路线:邦联、帝国和联邦。邦联式同盟是各个同盟建立初期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它的最大特征是充分尊重各个城邦的独立主权,早期的彼奥提亚近邻同盟便是邦联式同盟。帝国是实力强大的城邦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它是强权逻辑上发展的终点、同时也是对城邦制度的否定,崛起的底比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未放弃这一结盟形式。联邦是帝国和城邦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这一事物可以说是古希腊人的发明,并且,它也是希腊实现统一的最佳选择。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式的分立或松散的邦联式同盟无法使希腊世界的力量得到有效聚合,以对付外部世界的威胁;强制性的帝国虽然能够用强力将希腊世界整合为一体,但是它违背了独立自由平等的希腊精神,它的建立便预示着希腊文明的灭亡;联邦式同盟似乎是希腊世界寻找出路的最好选择,它既能聚合力量又尊重传统,在帝国和城邦之间确立了一种平衡,它被后世推崇为古代“最完美的”创造^{[10]17}。尽管彼奥提亚的统一长期被置于联邦的外衣之下,但是,强大的底比斯却始终在践踏着联邦原则,试图将同盟变为帝国;从根本上来讲,这种统一只是为底比斯城邦自身利益服务,“不是出于对彼奥提亚或希腊的整体利益考虑”^{[6]180}。公元前335年底比斯败亡后,彼奥提亚地区的整体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尽管在此后的历史里,彼奥提亚诸邦通过联邦制同盟形式走向了统一;但是,它是否统一或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无关大局,关键在于实力软弱致使彼奥提亚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变成了其中的被改造者。

总的说来,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并不成功,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希腊城邦所崇尚的主权独立原则、底比斯的帝国主义行径和强大的外部势力的干涉。彼奥提亚统一运动在公元前6世纪才有了实质性进展,而此时的希腊世界已经步入城邦制度的成熟期,其政治格局也基本定型;城邦间结盟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城邦主权的独立、至少是不能严重损害城邦主权的独立,所以,松散的邦联制同盟和组织较为严密的联邦制同盟都能为希腊城邦接受,但志在吞并加盟城邦、建立强制性统一国家的同盟却不为希腊世界所容。而此时崛起的底比斯却恰恰是采用了后一种方式来完成彼奥提亚的统一,它势必遭到彼奥提亚诸邦的强烈反对。如果没有外界干涉或周边的干涉势力不甚强大的话,底比斯也能够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来完成统一;但是,雅典、斯巴达等诸大邦不愿意看到崛起的底比斯威胁它们的利益,尤其是雅典,始终是积极破坏底比斯主导下的统一运动。尽管底比斯最终在伊帕米依达时代将彼奥提亚改造成了一个类似于斯巴达的强制性统一国家,但是,马其顿突入

希腊本土后很快将其肢解。此后,衰落的彼奥提亚虽然在后来成立了联邦制的同盟,又一次实现了统一;但最终不为入主希腊的罗马人所容,同盟于公元前171年被迫解体;至此,整个彼奥提亚的统一运动最终以失败划上了句号。

彼奥提亚统一运动贯穿了古希腊文明兴衰的整个过程,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泛希腊统一运动的一个缩影。二者都是在统一时机出现之后却未能采用恰当的方式促成统一,最终导致自身的衰败,这给后世留下了深刻教训;时至今日,仍有宝贵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 [1] Э·Д·弗罗洛夫. 现代古希腊罗马史著作中的城邦问题. 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编: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C]. 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
- [2] 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M]. Vol. II, London: John Murray, 1854.
- [3] Homer, Iliad[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G. W. Botsford, The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s of the Boeo-

tian League[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10.

- [5] Herodotus, The Histories[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6] Edward A. Freeman,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M]. vol. I, London: Macmillan & Co. 1863.
- [7] Diodorus Sicul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Plutarch, Themistocles The Library of History[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9]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0] 威廉·弗格森. 希腊帝国主义[M]. 晏绍祥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11] Polybius, The Histories[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2] Plutarch, Moralia[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3] Plutarch, Cimon[M].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

责任编辑 张颖超

On The Uniting Process of Boeotia

FENG Jin-pe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Boeotia was an important territory in Greece, and its uniting process was unique, contrasted with other territories. It not only lasted a long time but also experienced lots of setbacks. After the stage of confederation, the Boeotian unification fell into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ways of federation and empire. The powerful Thebes tried to make the Boeotian federal constitution into an imperial system, whereas some of the other states of this territory did their best to keep their independence relying on supports of exterior powers. Until the Hellenistic period, when the power of Thebes was pulled down, Boeotia was united with true federal constitution; but the unimportant unity was funnily destroyed by the Roman. Success and failure of Boeotian in the process of unification left far-reaching lessons for their descendants even in today.

Key words: Boeotia; uniting process; confederacy; confederation; federation; Empire